

# 宋初“三先生”之孙复学术思想考论

侯步云

(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, 西安 710069; 陕西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, 西安 710021)

**摘要:**“宋初三先生”之一孙复以《春秋》学名于当时,学人们多从其思想意义或时代价值进行定位。孙复《春秋》学以儒家之道为理论基础,其代表作《春秋尊王发微》是儒家之道在政治上的具体实现。从中国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,孙复《春秋》学对宋初儒学复兴、两宋《春秋》学以及理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影响。

**关键词:** 宋初;理学;孙复;《春秋》学

**中图分类号:** K244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0-5315(2009)03-0081-05

孙复儒学思想主要表现为《春秋》学,后学者一方面从孙复解《春秋》经的特点进行评论,或肯定其“不惑传注,不为曲说”,“得于经为多”<sup>[1]55</sup>,或批评其“春秋不达经例”,“有甚害于经者”<sup>[2]</sup>;另一方面则着眼于孙复《春秋》学的时代意义,或指其“就是对中央集权制的强调与维护”<sup>[3]428</sup>,或认为其以“推见王道治乱”<sup>[2]</sup>。如何理解孙复的《春秋》学的学术意义及时代价值,进而如何评价孙复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地位,这些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。本文试图对孙复《春秋》学作一总体性论证,以凸显孙复的思想学术贡献。

## 一 “夫子之道”

首先,孙复《春秋》学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、学术环境。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加强中央集权,但同时也带来了冗官、冗兵、冗费等新问题,外部面临崛起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。此时学人们普遍把目光转向儒家“六经”,而宋初经学“陵夷衰微”,无法担此重任,中唐时期啖、赵《春秋》学派曾一定程度上作出更新儒学的努力,但这种新学风经战乱近乎夭折。佛、道二教于宋初有所兴,士大夫参禅之风浓郁。如何应对现实的政治问题、儒学困境?孙复认为:“舍

六经而求虞夏商周之治,犹断潢污渎之中而望于海也,其可至哉?”(《寄范天章书二》)肯定儒家六经的致世之用。《春秋》本身含“君臣纲常”、“夷夏之防”等微言大义,有强烈的政治、历史批判精神。孙复立足于现实,重新解读孔子所修作的《春秋》。

其次,孙复《春秋》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为儒家之道。第一,“夫子之道”是治国的根本性大纲,其内容为仁义礼乐。“所谓夫子之道者,治天下,经国家,大中之道也”(《上孔给事书》)。“仁义礼乐,治世之本也,王道之所由兴,人伦之所由正”(《儒辱》),强调儒家仁义礼乐之道的政治、伦理规范作用。“大中之道”,“言圣人之治天下,建立万事当用大中之道”<sup>[4]</sup>。“大中之道”是对《中庸》“中”的应用,是圣人之治的指导原则。可见,“大中之道”是儒家之道的另一种表达,是王道之治的根源。第二,“夫子之道”表现在历史、政治、宗教、文学等各方面,孙复突出前两者。儒家之道在历史方面表现为道统论。孙复在《上孔给事书》中讲:夫子之道“基于伏羲”,中间经先王圣贤的发展,传至唐王通韩愈。可以看出:一是“道”的源头型,孙复把道统源头追溯到伏羲;二是“道”的阶段型,从伏羲到周公是“道”的创立阶段,孔子为治道

收稿日期:2008-06-22

基金项目:全国社科基金西部项目“宋代《五经》学与理学的关系研究”(08XZS006)。

作者简介:侯步云(1980—),女,河北邢台人,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中国儒学思想史研究。

作了理论准备,其对“道”的贡献超出伏羲、周公之功,从孟子到中唐韩愈是“道”的恢复或弘扬阶段。道统论的正式提出始自中唐韩愈<sup>①</sup>。同韩愈道统论相比,孙复把儒家之道的起点上推至传说时代,证明儒家之道的“源远流”性;把荀子、董仲舒以至王通和韩愈本人划入道统序列,证明儒家之道的“流长”性。

由上述道统论可以看出:韩愈所重构的儒家之道是孟子所讲的“仁义”,而孙复讲儒家之道包含仁义礼乐。有学者指出:孙复道统思想“对于提高儒学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,显然是在韩愈基础上的发展”<sup>[5]83</sup>。这指明了孙复道统思想的学术意义及承继关系,但似乎忽视了孙复对韩愈道统观的发展。在政治上表现为等级伦理秩序,主要是君臣一伦。孙复屡言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,君国之大经,人伦之大本也”(《兖州邹县建孟庙记》)。儒家之道是治国总纲,而其中的纲常名分是理正人与人关系的具体指导原则。“乾者君之道,坤者臣之道,衣上而裳下者,乾坤之象也”,“天子之位益尊”(《舜议制》),突出君王权位至上至尊。同时又对君王提出要求,《世子蒯聩论》以卫国内乱为例,把矛盾的源头指向卫灵公,“生不能治其室,死不能正其嗣”。君王有责任理顺等级名分。为臣者既要尊君,又要尽臣职。《文王论》指出:文王“有庇民之大德,有事君之小心”,意指臣子在“德”与“君”之间要有效地坚守纲常礼制。孙复尤其强调为臣者要积极奋发,有为行事,《罪平津》中斥责平津“自图安乐为事”。这一层面的含义更具体地表现在孙复《发微》中。

由上可知,孙复所言“夫子之道”即儒家仁义礼乐之道,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,其实质是重新确立儒家之道的主体地位。“夫子之道”、“仁义礼乐”、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是儒家之道在不同层面的不同表达,孙复突出政治伦理的秩序建设。所以,孙复讲“夫子之道”侧重儒家之道的现实应用、制度建构等形下层面。

## 二 “尊王”大义

首先需要说明的是,“尊王”这一《春秋》主旨并非孙复解经所独有。同为“三先生”之一的胡瑗,对《春秋》之“尊王”也有所发挥。“蔡人、卫人、陈人从王伐郑”条,胡瑗不从三传,或从事实或从字义解经,认为:“不书王师败绩于郑,王者无敌于天下,书战则王者可敌,书败则诸侯得御。故言伐而不言败。”突出现实君王的绝对权威。对于“茅戎书败”与王者无

敌的矛盾,胡瑗则从字缝中寻解,“王师,非王亲兵,致讨取败而书之”,以反例的形式证明天王的至尊无上。可见,“尊王”是宋初学者解《春秋》的普遍认同。

但相较而言,孙复所解“尊王”颇具条理性、整体性。《春秋尊王发微》<sup>②</sup>以儒家之道为理论指导,阐明“尊王”大义,其实质是尊崇儒家政治伦理规则。“尊王”由内对诸侯、大夫以及君王本人,外对夷狄评判来完成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孙复治《春秋》,“有贬无褒,大抵以深刻为主”<sup>[6]214</sup>。“有贬无褒”是清代学者对孙复《发微》内容的总评。分条来看,则另当别论。在僖公四年“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”条,孙复指斥夷狄“创艾中国久矣”,而齐桓公帅诸侯兵不血刃,制服夷狄,则“召陵之盟,专与桓也”。以抵抗地域意义上偏远少数民族侵扰来肯定齐桓功绩,是褒而非贬。只是孙复笔锋一转,道出“孔子伤圣王不作”,齐桓有攘夷狄功绩之实而无“圣王”之名。但是,孙复对齐桓的褒扬是无疑的。比较鲜明的例证是孙复对夷狄的看法。僖公二十一年“执宋公以伐宋”条,一方面孙复坚持“抑强夷而存中国”的华夷之别;另一方面由对楚称谓的变化指出:称人称子“以其渐同中国”,“修礼来聘”,即赞许夷狄主动接近中原礼乐文明,此时“夷”为道德文化之“夷”。所以,在宣公十一年“楚人杀夏征舒”中,孙复论:“与楚讨也。”明确赞赏少数民族在践守礼制文明方面的行事。

有学者认为:“宋人之所谓夷狄、中国已是固定实体而不可变。”<sup>[7]24</sup>“不变实体”是地域意义上划分的中国、夷狄,是就当时宋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而言。在孙复这里,夷狄所指有变化。昭公十二年“楚子伐徐,晋伐鲜虞”条,孙复认为,晋国作为盟主,本应救助被楚国所灭的陈、蔡,但却“与楚交伐中国”,所以晋国行为“此夷狄之道也,故夷狄称之”。所谓“夷狄之道”,即与先进礼制文明相背离的行为方式或原则。孙复倾向于以礼乐文明划分文化之“夷”,发挥“尊王”大义。即使是“攘夷”这样的民族原则,孙复同样以仁德礼制来衡量。宣公十五年“晋师灭狄潞氏,以潞子婴儿归”条,孙复解为:“夷狄乱华,诸侯驱之逐之可也。”灭其国、执其诸侯就过分了,“攘夷”也是有标尺的。

孙复主张“尊王”,但并非无原则的尊崇威权之君王。襄公三十年“天王杀其弟佖夫”条,孙复引《书》帝尧之德,讥贬周王有失兄弟之道。这里贬斥

的是现实之“王”背离仁义纲常。可见,孙复“尊王”尊的是“王”内在的评判标准,仁德礼制。

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》引常秩言,“谓其失于刻也。”<sup>[8]</sup>《四库》馆臣也认为:“过于深求,而反失《春秋》之本旨者,实自复始。”<sup>[6]214</sup>究其实,孙复《发微》中,以“尊王”为目的,确实存在太过苛刻要求的例证,如要求小国诸侯“死难其国”(庄公四年“纪侯大去其国”条)。但“有贬无褒”是孙复解经所呈现的整体方式方法,中间存在先褒后贬、先是后非的状况。

孙复对孔子所修作《春秋》始于隐、止于哀的认识,也彰显“尊王”之义。“《春秋》,鲁史故也”(庄公十四年);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以天下无王而作也”(隐公元年)。“无王”实指礼乐崩坏后的文化、政治现象,并不单指无现实个体之“王”。以无王而尊王。《春秋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,孙复把春秋之世分为三段:“诸侯分裂之”,“大夫专执之”,“夷狄宰制之”;自获麟后,“孔子伤圣王不作,中国遂绝也”,意指先进文明、礼乐道德上的文化中国不复为中国。“圣王”是理想王道之治的代表,以“圣王不作”而“尊王”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孙复由“圣王不作”而与“天”相联系。“昔者圣王在上,五事修而彝伦叙,则休征应之”(桓公元年)。即天具有道德意志,主宰人事。“凡日食者,人君皆当戒懼侧身修德以消其咎”(桓公三年)。把王道仁政与自然现象相联。这里孙复简单继承了汉代学者天人感应说,但前人所论是以人格化的“天”限制君主权威,孙复似乎以人格化的“天”辅助现实君王的仁政,其原因在于孙复《春秋》学倡“尊王”大义,王道之治。孙复阐明《春秋》“尊王”大义,是其《春秋》学的特质。“尊王”尊的是理想之“王”所内含的仁义礼乐指导下的统一秩序,含文化统一之义。有学者指出:“孙复《春秋尊王发微》旨在阐发《春秋》经,但他却为现实的宋专制主义唱了一曲赞歌。”<sup>[9]228</sup>这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,突出孙复《春秋》学的政治意义,但不免忽略了其中的文化含义。

### 三 评价

《春秋尊王发微》是孙复所解读的儒家之道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实现。儒家之道在这里表现的多是纲领性的行为程式,缺乏形上层面的道体建设,所以《发微》所阐发的“尊王”大义实质是对儒家之道制度、规范的回归。有学者评论:孙复《春秋尊王发微》

强化儒家伦理,走不出经学的藩篱<sup>[10]461-462</sup>。这种评论从学术逻辑发展的角度道出了孙复《发微》思想的局限性,但孙复在重申儒家之道文化内涵方面所作的努力是不应忽视的。孙复《春秋》学思想对儒家之道的回归、宋初义理理解经学风的导向及理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影响。

第一,儒家之道的回归。回到儒家经典,抛开汉唐注疏载体,这是宋初学人面对当时的政治、文化困境,进而检讨儒学自身所得出的结论。从思想学术的逻辑进程来看,这种回归既是对汉唐经学沉滞的反思,又是北宋中后期性理之学兴盛的必经之路。孙复以重解“夫子之道”参与这种回归,主要表现为道统思想、政治伦理。前者是对儒家之道的历史性解读,后者是儒家之道的具体施展。孙复道统思想在前人韩愈道统观的基础上,进一步把“道”的统序从形式上追溯至伏羲,把“道”的内涵扩展为仁义礼乐。政治伦理则突出对《春秋》经的解读,《春秋》经本身以对历史事件的褒贬而包含价值原则。孙复《春秋》学抛开章句解经,重新阐释《春秋》经,发挥“尊王”思想,申明儒家仁义礼乐之道,建立统一的文化、政治秩序。这种回归在学术上促进了儒学的复兴,在政治上则为当时政权运作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向。

第二,引导宋初学风。宋初经学承汉唐经学训诂之弊,儒学自身失去了活力。孙复起而怀疑六经注疏,主张“讲求微义,殚精极神”(《寄范天章书二》),即舍传求经,直寻圣人精神,以义理<sup>⑤</sup>解读。《发微》不囿传注,独出新意,“先生治《春秋》不惑传注,不为曲说以乱经”,“得于经之本义为多”<sup>[11]</sup>,指明孙复《春秋》学以主观体验解经的治道精神。孙复《发微》上承中唐啖、赵《春秋》学派义理解经的特点,以己意“发明圣人之意,指摘三传之谬”<sup>[2]</sup>,又进一步结合社会现状,突出“尊王”的政治、文化内涵;下启两宋对《春秋》大义的研究,如孙觉《春秋经解》承孙复《春秋》学解经主旨及“尊王”思想。

《宋元学案》认为:“宋世学术之盛,安定泰山为之先河。”<sup>[12]25</sup>又称:“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,实自三先生而始。”认为宋初“三先生”以师道明正学,“正学”即为儒家之道。这种“先河”、“宋初三先生”的评论是对其治学精神、理论导向的学术定位。就孙复而言,“三先生”的定位一方面在学术上体现为《春秋》学是宋学中义理之学的初步尝试;另一方面在政

治上表现为高昂的致世精神,以《春秋》为“孔子之用”,“治世之大法”<sup>[12]95</sup>。又,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认为:“自汉儒至于庆历年间,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,《七经小传》出,而稍尚新奇矣。”<sup>[13]190</sup>这里以稍后于孙复的刘敞著作《七经小传》为宋初破汉唐注疏的代表。那么,孙复在宋初学术的“先河”地位为什么没有在王应麟的学术评论中得到认可呢?从《七经小传》的内容来看,每条大都是论经文的一字、一义,纠正前人说法。如对《左传》“都城过百雉”的看法,刘敞认为,依传中所论都城占地面积计算,则“如何建宗庙社稷,如何居民,如何守御”,所以此解“不近人情之尤者”,进而肯定《公羊》的解释。可见,刘敞立足于人之常情,有条不紊地反驳注疏,针对性较强。反观孙复《发微》,在“尊王”的主旨下,于“三传”有所取舍,阐述大义,但又自立“凡”,进行贬斥。“凡书葬者,皆恶之”,平王东迁后,礼废而僭越者尤甚,“皆自溢之而又僭称公焉”(隐公三年)。究其实,这种主观感性判断并不能通贯全经。“乙丑葬我君桓公”(桓公十八年),孙复解此条为:“臣子自溢以公礼而葬也。”此解与所自立“凡”不合。

由此可见,孙复在宋初学术上的“先河”地位,是基于其总体上解经于大义,而非单纯的训注;刘敞《七经小传》主要是有功於破除汉唐经学训诂,以例解经。对二者评价角度不同,故立论各异。

第三,对理学的发生有一定的奠基作用。这里的理学主要是指狭义的探讨心、性、气、理等概念的性理之学。应该说,孙复《春秋》学在形上建设方面没有独出、创新性贡献。如程颐讲:“孙大概唯解《春秋》之法,不见圣人所寓微意。”<sup>[14]402</sup>即孙复不通“法”之所以然之“理”。至于为什么不通“理”,程颐没有言明。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,一方面,由于战乱文献典籍流失严重,宋初最高权力者着手于儒学的修复工作,总体上学人进行形上思考的文化氛围不具备;另一方面,北宋初期面临国家的统一,政治经济等制度的完善,以及相应的理论支撑。结合这种社会需要,孙复的学术选择倾向于对儒家之道制度、功能层面的阐发。从个体的学术气象来看,对比孙复和胡瑗的治学特点,“安定笃实,泰山刚

健”<sup>[12]25</sup>，“安定冬日之日也,泰山夏日之日也”<sup>[12]66</sup>。可以看出:孙复治学凛然强劲。以孙复“夏日之日”的学术个性,对“理”进行抽象思考有一定的难度。虽然石介讲:“先生(孙复)尝以为尽孔子之心者大易。”但孙复《易说》今不传,无从考证其对心、《易》的理解。从学术的内在进程来看,黑格尔曾提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,即逻辑与历史的统一,逻辑是在历史基础上的逻辑。以此来观照中国思想史,则北宋理学的发生与宋初的历史现状息息相关。孙复作为历史现实中的个体,不可能超越社会理论的需要而直接、全面地进行抽象性理论探索。一种哲学体系的建立有其自身必然的演变过程,宋代理学的完备经历了由“破”到“立”的历史阶段。北宋初期的儒学复兴正是为后期性理之学理论体系的升华扫清障碍,孙复身处宋初的学术环境,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破除旧有的理论束缚,如倡导儒家道统,摒弃汉唐注疏之学,寻求圣人大义,从而为心性之学的构建提供一种思考或启示。

以上是从相对的角度分析孙复形上理论建设的不足,并非绝对否定这一历史阶段某个体学人对某一哲学命题的有益探析,如范仲淹治《易》讲“气”,胡瑗《周易口义》中讲人性论,这种粗略性的理论探索,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后期理学体系的建构。尽管孙复于“理”有所不通,但其对基本方向的把握符合儒家精神。朱熹讲:“本朝孙明复之徒,虽未能深于圣经,然观其推言治道,凛凛然可畏,终得个圣人意思。”<sup>[12]94</sup>一方面指出孙复《春秋》学理论深度有缺,另一方面肯定其“治道”精神,对理想秩序的规划。“得个圣人意思”即孙复所理解的儒家仁义礼乐之道,道理“平正”(朱熹语)。又,孙复《春秋》学所反映出的天与人的关系,“天”具有道德规范,是人格化的至上主宰。有学者指出:孙复强调纲常道德,天道也有道德伦理,“人间的封建道德规范和天的道德规范是一致的,这里就有了理学体系的萌芽”,“到了后来理学家的手里,人格神的色彩就越来越被冲淡”<sup>[15]37</sup>,道出了孙复《春秋》学对理学某一具体命题有一定的学术贡献。

#### 注释:

①参见孙复《孙明复小集》(四库全书文渊阁本),以下只注篇名。

②孙复《春秋尊王发微》,四库全书文渊阁本。以下简称《发微》。

③这里的“义理”是与汉唐诸儒治经所重章句训诂之学相对而言,旨在寻求儒经大义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陈振孙.直斋书录解题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2]朱彝尊.经义考:卷一百七十九[G]//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5.
- [3]赵伯雄.春秋学史[M].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,2004.
- [4]胡瑗.洪范口义:卷一[G]//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5.
- [5]吴德义.论孙复思想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[J].晋阳学刊,1990,(4).
- [6]永瑛,等.四库全书总目:卷二十六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7]杨向奎.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[J].史学史研究,1989,(1).
- [8]晁公武.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[G]//四部丛刊.上海:上海书店,1985.
- [9]漆侠.宋学的发展和演变[M].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2.
- [10]崔大华.儒学引论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1.
- [11]欧阳修.欧阳文忠公集:卷二十七[G]//四部丛刊.上海:上海书店,1985.
- [12]黄宗羲.宋元学案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33.
- [13]王应麟.困学纪闻[M].孙通海校点.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.
- [14]程颢,程颐.二程集[M].王孝鱼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1.
- [15]侯外庐,邱汉生,张岂之.宋明理学史:上卷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4.

## A Study of Sun Fu's Academic Thought

HOU Bu-yun

(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, Northwest University, Xi'an, Shanxi, 710069;  
Management Institute, Sh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Xi'an, Shanxi 710021, China)

**Abstract:** Scholars generally appraise Sun Fu, one of the “Three Masters” and known for his study of *Chun Qiu* (*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*)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, by his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era value. Sun's *Chun Qiu* study is based on Confucianism, of which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*Chun Qiu Zun Wang Fa Wei* is a concrete embodiment of Confucianism in politics.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's academic ideology, Sun's *Chun Qiu* study has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Confucian revival, *Chun Qiu*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Neo-Confucianism.

**Key words:** Early Song Dynasty; Neo-Confucianism; Sun Fu; *Chun Qiu* study

[责任编辑:凌兴珍]